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7)02-0068-(07)

编者按:以鲁迅研究引起学界瞩目的黄健教授,以“上海书写”的独特视角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并将此话题置于晚清以来的文学史中予以观照,认为此时期的“上海书写”,与当时繁华都市中西交汇、消费文化、市民气息的文化氛围相关,并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一种国家元叙事,这成为一种独特的视角与见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黄健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浙江杭州 210028)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寄寓了晚清以来对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理念,构筑了现代文学追求宏大性的国家叙事的意义空间,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国家元叙事。同时,这一时期的上海,已完成了从开埠之初的小渔村、渔港,向现代大都会的转变,都市文化得到蓬勃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汇,消费文化的盛行和都市市民气息的混合、杂糅,又成为现代文学中“上海书写”的一大特点。无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书写”,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情感基调和时代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它牵动着现代中国敏感的神经,对应着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现代文学;上海书写;民族国家;都市文化;乡村文明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在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如何使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城”与“市”对应现代化的都市发展需求,也就成为现代都市文学创作的一个中心命题。在中国新文学生成之初,对城市的书写,基本上还是反映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风貌。虽然当时大部分的作家居住在都市,但是他们的视线仍然习惯性地投向乡村,常常把自己看成是都市的他者,似乎广袤的乡村才是他们灵魂的所在。鲁迅在谈到1920年代“乡土文学”时就曾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

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克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世界。”^{[1](P247)}现代化的都市进程,使人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心境之中:一方面心中始终存有一个乡村的梦境,另一方面却又无法真正离开都市的生活。所以,如何真正地展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风貌,上海——这个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就成为现代文学展现中国现代都市风景的一个最主要的书写对象。

收稿日期:2007-01-18

作者简介:黄健(1956-),男,江西九江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的“上海书写”

当近代中国被迫进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被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社会的强烈震荡使整体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基础性的动摇,传统的意义系统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不足以支持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二是现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吻合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主流,重建新的民族国家风貌。因为“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2](P194)}对现代中国而言,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一直都是构成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李欧梵指出:“这种现代性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3](P5)}他以梁启超为个案,认为梁启超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有关“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在论述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特点时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的想象形式,它源自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的深刻变化,“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4](P8)}依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进入现代文明之后,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兴起与发展中都会有一个想象(Imaginary)的过程。这是一个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它所形成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由此奠定民族国家的共识基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所建构的想象共同体的空间,都需要营造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以便使所产生的意识、观念能够成为全体成员的共识。而文学作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也自然要担负起这种想象共同体的职能。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视角来看,现代文学在进入以追求“社会解放”为主导的时代之后,上海之所以被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书写对象,被赋予诸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功能,也就在于:它被认为能够

通过想象,将有关追求社会解放、追求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意识、观念,形象化地转化成人们的共识。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一直居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充当了中国现代化领头羊的角色,积聚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对上海的书写,也就被充分地赋予整个民族热烈企盼现代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人们从“上海书写”当中,能够更多地领会到有关民族独立、社会解放、迈向现代文明的诸多宏大的叙事价值。换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达出了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意义诉求。

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语境中,有一类话语在“上海书写”中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具有左翼特征的“革命性”话语。这种话语的基本理路,主要还是沿着晚清以来有关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路径演化而来,其特点是以偏重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进一步地增强反叛传统、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性”话语色彩,凸现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话语权力。“革命性”话语对“上海书写”的意义赋予,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将上海描绘成一个革命的“飞地”。在对应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现代性诉求当中,往往是灌注以“我们”为核心的集体主义意识,使“上海书写”成为具有革命感召力的能指对象。像左联五烈士之一的革命诗人殷夫,在《别了,哥哥!》一诗的小序中,他就明确地写道:“算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诗人写道:“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我”和“哥哥”的手足之情不能说完全泯灭,但在对应民族国家主体的诉求时,它只能处在次要的地位。尽管诗人也会以“我”的呼声讴歌,但这个“我”所包容的则是民族国家集体的“大我”,而非纯个体性的“小我”:“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我也是历史的长子,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血字》)这个包容民族国家集体意识的“大我”,投射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所呼唤的就是“要成为报复的椰子”、“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分成镰刀和铁锤”、“成为断铐和炮弹!”

这种“革命性”话语对“上海书写”的影响,就

是将上海描绘成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建立新国家的革命策源地。因为与资产阶级的“颓败”、“腐朽”相比,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殷夫:《上海礼赞》)。且不说上海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实际上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上海就以其独特而占据优势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积聚着现代中国诸多的革命能量,散发出大量的革命信息。像郭沫若此时讴歌上海的诗作,就不再具有“五四”追求“个性解放”时的情感,而是“我赤着脚,蓬着头,叉着我的两手/在马路上旁的树荫下傲慢地行走/赴工的男女工人分外和我相亲”。与新兴的无产者的“我们”亲近,所展现的是“劳资”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面的是劳动人的血汗与生命!/血惨的生命呀,血惨的生命,/在富儿的汽车轮下……滚,滚,滚……/兄弟们哟,我相信:/就在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上海的清晨》)在蒋光赤的小说里,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暗势力的铁蹄踏得居民如在地狱中过生活,简直难以呼吸。”(《短裤党》)田汉的戏剧、夏衍的报告文学,也都将上海看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之地,“包身工”、“卖身工”既成为上海资本主义罪恶的写照,也成为无产阶级号召集体革命的旗帜。“上海书写”激发着具有左翼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当时“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着密谋的氛围。”^{[5](P437)}“革命”——这个在“五四”时期以追求“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主导内涵的话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书写”中,就被转化成为以追求“社会解放”为主导的,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内涵的话语与意义的表述,从而为现代文学构筑宏大性的民族国家革命叙事空间铺平了道路。

左翼特征的“革命性”话语对“上海书写”空间的建构,所展现的仍然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图景。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主题的深化,题材选择范围的扩大,内容的丰富,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多样化,茅盾就对现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新的开拓。他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性、社会性内涵,自觉地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结合,以便能够充分地反映

中国社会、时代的全貌和发展前景,凸现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史诗性特征。在谈到《子夜》的创作意图时,茅盾就说:“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6](P553)},要“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国面貌”^{[7](P561)}。基于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理念,茅盾的“上海书写”,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运用现代思想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思考、探索和描绘。可以说,茅盾不仅改变了“五四”文学对现代性诉求的某些幼稚状态,更重要的是在深化现代性内涵方面,进一步地体现出了现代文学对新的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道义承担。因此,茅盾的“上海书写”,通过民族资本家与各方面的矛盾、纠葛,以及走向悲剧结局的展示,全方位地揭示出了上海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互依存的内在关联,并昭示人们:上海已成为演绎现代民族国家认真思考如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窘境,如何迈向现代化的一种国家元叙事。因为上海已在许多方面成为整个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缩影,它所遭遇的困境、难题,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所展示的未来,都被强烈地赋予了国家意义,使之具有国家性的认知与思维。

李欧梵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话语特征时指出,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像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样,由于对现实的绝望而遁入内心,遁入艺术之中,相反,他们对社会现实和民族——国家的状况充满焦虑,并且积极投入现实的变革。他们从来不拒斥和批判启蒙理性,相反,他们对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张扬。他们从来没有在个人与集体之间陷入幻灭,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感到断裂。因此,“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理想。”^{[8](P236)}从这个角度来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文学的“上海书写”,我们会发现,左翼特征的“革命性”话语,通过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就突出了“上海书写”对应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并赋予文学一种鲜明的目的性的创作态势,同时,也使文学自身成为朝向未来过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意识指南,一种精神性的向导。

二、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中的“上海书写”

白鲁恂在描绘当时的上海情景时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9]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上海率先完成了由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都市文明的转变。如果说上海的都市文化本质上还是一种现代的大众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则是以现代的工业化、商业化的都市为环境的。上海外滩的改造，工商经贸的国际化，以及由现代化所带来的南京路的繁华，高楼、洋房、霓虹灯、电影院、舞厅、舞会、咖啡店、跑马场、赌窟、弄堂……这些上海显性的形象，所对应的则是摩登、欲望、消费、时尚、白领、小资、赌客、市民等上海形象的隐性内涵。现代传媒业的发达，与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和繁花似锦、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上海大都市独特的节奏和独特的文化韵律，最为突出的是形成了上海所特有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的制约下，上海被赋予另一种的现代性内涵，即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一个现代都市，同时还是远东最具魅力的都市，并且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大都市，如巴黎、伦敦、纽约等，几乎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具有现代的工商业文明的现代性内涵。因此，从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上来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文学的“上海书写”，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都市文化，特别是现代都市文明病的诸多特征。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种奇异的都市文化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上海书写”往往展现为这样一种镜像：

这些椅子似乎从来不会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钟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会从来没有人光顾，做了半天冷板凳的。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上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江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

子和铅笔，用心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茅盾：《交易所速写》）

交易所也许只是上海都市当时的一个特有象征，但给予人们心灵的感受，则是另一种滋味，借用茅盾小说《虹》的主人公梅的话说：“上海当然是文明的都市，但是太市侩气，你又说是文化的中心。不错，大报馆、大书坊，还有无数的大学都在这里，但这些就是文化吗？一百个不相信！这些还不是代表了大洋钱、小角子，拜金主义就是上海的文化。”对于大都市的文明，穆时英则写出了上海都市的另一种疯狂的镜像：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 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上海狐步舞》）

这是个肉欲的世界，运意象都充满了肉的气息。“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富士烟不伤吸者咽喉……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铺，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穆时英以罗列大量的物质形态来表现他对上海大都市的感觉。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都市，流淌着情欲和物欲。而郁达夫的“上海书写”，则被揉进了都市的下层贫民生活镜像：“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的确，上海都市里有摩天大楼，灯红酒绿，但也有贫穷与苦难。这表明上海都市形象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世界，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转一转便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就是这个充满欲望和矛盾的大都市，上海，总是在不断地刺激着现代的中国人。它让人生机勃勃，又让人颓废沉沦。这些似乎在农耕社会不曾有过，或者曾被农耕民族推崇的道德理想紧紧抑止住了的人性矛盾，在处于转型之中的现代中国大都市的上海，被提前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看到了现代中国人的人性真面目。此时的“上海书写”，在展现消费文化镜像时，其特点就是对人

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内心欲望进行了充分展示。如果说物质世界是上海的外表,那么,在消费文化促使人的物欲无限膨胀下,人与人之间那种传统的温情则是被金钱和利益所控制的内心矛盾,则是“上海书写”的重心。在这种书写中,人成了物的奴隶,“一切抽象的东西,如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到”。(刘呐鸥:《热情之骨》)在物欲和情欲的驱动下,人的灵魂开始扭曲、变异。人成了衣帽服饰、人成了金钱的数量、人成为“JASS,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而惟独没有了自己。在物欲和情欲的世界里,人终于异化成了一种消费动物。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蓉子就是这样一个“在速度和刺激上生存着的”都市女郎,即使是恋爱也被她当成了一种消费行为,男子们一个个就像“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一样,迅速地被消费然后被排泄;另一方面,蓉子又何尝不是被那些都市男子当成了消费品,转眼即被排泄。都市人的男欢女爱本来就已成为相互交换的刺激,一旦刺激消失,便失去了它的用途,正如用坏了的商品,可以随手丢弃。人已经彻底泯灭了自身的特性,在享受消费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商品被人消费,人成了非人。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章克标、曾今可、徐蔚南等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性爱”作为小说的表现对象。这不仅仅只是为了消费需要,更重要的原因是“性爱”、“性欲”主题,最能对应和满足被“物欲”弄得几近发狂的人的心理需求,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尤其是张资平唯美式的“性爱”描写,多多少少突破了早期鸳鸯蝴蝶派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性爱”格局,融进了现代都市人对“性爱”的更多、更深入的理解。

刘呐鸥、施蛰存则是从另一个维度进行“上海书写”。在他们的笔下,上海都市的一切则是显得那么的荒诞。所有的伦理道德都被颠覆了,原本熟悉的秩序都被打乱了。刘呐鸥的作品似乎篇篇都在述说着这个世界的荒诞。《卫生问题》中妻子与人私奔,却将妹妹留给了丈夫,以免丈夫嫖妓不卫生。《风景》中一对素昧平生的男女,男的替报社采访会议,女的去陪她的丈夫度周末,两人却中途下车做了一场露水夫妻,而后再各自登上返程的列车,忘了此行的目的。《流》中姨太太

趁老爷“醉在第四次新婚的梦里不醒”时在外偷情,又以后母之身来堵发现了奸情的儿子之口。都市里已经没有了真情和道德,有的只是一场肉欲的盛宴。沈从文笔下姨太太与少爷偷情,绅士太太借此获得物质和性的满足。施蛰存小说显示出来的荒诞更是深入到都市人的内心,他笔下的都市人无不患有各种精神的疾病:忧郁症、恐怖症、妄想症,种种“魔道”、“妖妇”、“梦魇”的描写,都反映着这个荒诞的都市对人的心灵的扭曲和变异。

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它牵动着现代中国敏感的神经,折射着中国社会向何处的命题。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中的“上海书写”,反映出了中国都市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断裂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屈辱与自尊,文明与罪恶。这一切又都构成了中国现代都市的奇特面貌:它既是生机勃勃的,又是腐朽的;既是伟大的,又是堕落的;既有着西装革履的洋场阔少,也有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既产生着激进的思想理论,也维持着最传统的生活方式。西式洋房中陈列着明清时代的红木家具,西裤外面罩着中式的长袍,中西杂陈,华洋共处,中国都市文化在以西方为范本的同时,又保留了诸多的本土特征。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各自的文明都成为碎片,然后又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形象的大拼盘,令人陶醉、迷恋,又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

三、现代乡村文明视阈中的“上海书写”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书写”中,现代乡村文明的映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之所以说是“现代乡村文明”,而不是“传统文明”,或“农耕文明”,在于从文化审美的角度上来说,现代乡村文明具有一种反思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思想张力和唯美情怀。因为它本身也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形态,是现代人在获得自身的解放之后,对自身文明进程的一种内省和检视。与多少带有一些狂热的都市文明相比,现代乡村文明更加注重以情绪内敛、理性节制的方式,来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反省和批评。

以现代乡村文明的视阈来进行“上海书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

都市批判精神。上海,在他们那里激起的不是工业文明的“速度”与“力”之美感,更多的是一种文明被异化的异己感。一方面,在殖民都市中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的残酷事实,使他们无意于欣赏机器大生产的“速度”与“力”之美,另一方面,悠久的农耕文明培养出的道德标准、人格理想,在进入都市时竟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也令人们感到巨大的现实落差。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来检视,宗法制的伦理模式使得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伦理关系当中。它既束缚着个人,但也为个人提供了安全和温情。然而,现代化的商业都市却是一个完全以个人为本位的竞争社会,都市的新移民在脱离了家族宗法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人际温情和道德规约。他们在都市的法则下锻造着与传统社会下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情感趣味和思维方式,都同这个陌生的都市发生了冲突。因此,当强大的商业都市文化迫使人们改造自己来适应它的发展,当中国固有的传统、习惯、礼仪和各种行为准则在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逐渐支离破碎时,对上海都市的批评,又构成了“上海书写”的另一道风景。

沈从文是对都市批评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现代作家。1928 年赴上海后,他并没有被上海这个大都市所吸引,相反,他更多是以一个“乡下人”的文化视角,来冷静地、理性地看待纷繁的大上海。虽然不能完全断定他的有关都市小说,写的就一定是上海,但是在文化审美的泛文本意义上,我更乐意将他他对都市的批评,看作是构成他的“上海书写”的一个范本。因为在沈从文看来,现代的大都市割断了人与大自然的天然联系,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都市人,彼此都在都市里忙忙碌碌,却没有了共同的背景和深厚的情感联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人与人之间除了发生利益的关系外,再没有心灵的沟通,真诚、友谊、亲情、信任等美好的情感极度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市人极易产生孤独感。他的小说《船上岸上》,就描写了在船上因想念母亲而忍不住“拥着薄被哭”的青年“叔远”,终于忍不住城市的冷漠与磨难,回家了,而留在都市中的是无家可归的“我”。《都市一妇人》则是写一个经历了一生坎坷的都市贵妇人,为了不再被所爱的男人抛弃,竟下手将

小自己十岁的英俊军官丈夫的眼睛毒瞎的悲惨故事。《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等小说,所反映的则是都市人的爱情和家庭道德变异的状况。《绅士的太太》则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在这里,温情脉脉的家庭情义已烟消云散,夫妻之间相互欺骗,无聊的交际,糜烂的乱伦,完全颠覆了传统文明的价值规范。显然,都市的变异,实际上也就是人性的变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跻身于像巴黎、伦敦、纽约这样的大都会行列当中时,也同样染上了现代大都市所特有的社会文明病,尽管就当时整个中国而言,并不具备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准,但由于上海都市的特殊性,则使它在许多文明发展的水准上早早地与世界接轨,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上海,尤其是具有殖民意味的文化植入上海文化之中,与上海特定的社会、文化相杂糅,从而使现代中国提前具备西方 20 世纪末才具有的诸多变异的精神元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上海书写”,又一次刷新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诸多记录。

上海都市所发生的种种涉及到人的本性变异的现象,在现代乡村文明的映照下,显得是那么的黑白分明。在“上海书写”中,现代作家更愿意以乡村文明的视角和价值尺度来予以评判,而不完全是像西方现代作家那样致力于从形而上的哲理角度来表现人,特别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前景。像卡夫卡,他的深刻之处在于始终都是以关注着人类发展前景和对人的命运的严峻思考,来透视人的生存境况和人性的困惑。而在现代作家表现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罪恶时,时常引发的则是对乡村文明的美好回忆,甚至是引发忍不住要经常到乡村去休憩身心的心理冲动。施蛰存的《魔道》、《夜叉》中的主人公都是被邀请或回到乡村小住治疗神经衰弱的症状。沈从文的《夫妇》中的“潢”,《三三》中的白脸少爷也是到乡村中养病的都市人。在现代作家看来,都市中的人都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的,这种疾病只有乡村的空气才能治得好,这正反映了都市人对于乡村的那种始终摆脱不了的“恋母情结”。然而,虽然乡村依然被想象成母亲和精神家园,但在如今它只能提供一点安慰而已,终究不能根治现代都市人的漂泊心结。就像《魔道》中的“我”、

《夜叉》中的卜士明,反而在乡间加重了病症,而《夫妇》和《三三》里面的两个希望在乡间治疗的都市男子,也最终都没有达到目的,或者怅然离去,或者病重身亡。乡村,对都市人而言,毕竟只是一个梦境,都市人再也回不去他们曾经的家园了。

乡村文明的“光韵”尽管让人怀恋,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逐渐地消逝”。^{[10](P13)}在现代文学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上海书写”总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情感基调和时代意识有着内在关联,与20世纪中国所热衷的进化论思想和革命话语,与强调民族独立、社会解放,以及与张扬人的主体性、个体性等精神元素的叙事形态紧密相关。它牵动着现代中国敏感的神经,对应着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书写”无论是作为叙述场境,还是作为文学意象被重视而具有特定的标志性,都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审美张力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 [1]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A].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3] 李欧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05.
- [5] 许纪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6] 茅盾. 《子夜》后记[A]. 茅盾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7] 茅盾. 再来补充几句[A]. 茅盾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8]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 [9] 白鲁恂. 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J]. 二十一世纪,1992,(2).
- [10]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Shanghai Writing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s and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HUANG Jian

(Chines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Writing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s and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are imbued with ideas of a modern nation as a state community approved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built up a meaning space whe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rives for a grand paradigm for narration of national events, thus becoming a primary narration style in moder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Shanghai in the 20s and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had accomplish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little fishing village and a little fishing port to a modern grand city. As a result, its urban culture had flourishe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culture, the domination and popularity of a consumer culture, and a mixed atmosphere of urban residents became a major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Shanghai writing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Undoubtedly, “Shanghai Writ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y memories, emotional keynote, and epoch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get on the sensitive nerves of modern China, directing toward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Writings”, nation as a country, urban culture, rur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吴晓明)